

五月的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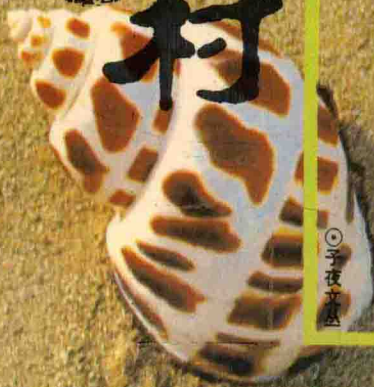
阿多



◎ 阿多◎ 著

◎ 成都出版社

◎ 子夜文丛



五月的乡村

阿 多/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成都出版社

五月的乡村 (《子夜文丛》)

作 者: 阿 多

责任编辑: 黄开国

封面题字: 马识途

封面设计: 瘦 鬼

技术设计: 瘦 鬼

责任校对: 天 地

出版发行: 成都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2号百花苑

邮政编码: 610072

电话号码: (028) 7765071 7783841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新凤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2月第1版

印 次: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48

字 数: 960千

印 数: 1—1000册

书 号: ISBN7-80575-956-1/I·258

定 价: 81.60元 (全套1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五月的乡村



王羲之



阿多 本名谢再明，土家族，男，大专文化。1963年种包谷的季节出生于川东南山里。19岁师范学校毕业，去乡下教书五年后，调任中共黔江县委副书记三年，后调黔江地区一地级机关供职至今。业余习小说、散文（兼爱摄影），从1985年起已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计40余万字。现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辞典》上说：“其小说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沉健，离奇的故事中有时代的脉搏和人生的哲理；散文语言清丽，娓娓道出的是平常的生活和生活的不平常。”

在這種人生又一段心旅之後，我是那樣的不能
忘懷我的故鄉——一個偏居城區十多公里的山
溝。而且，這份情懷也愈發強烈，夢也有她。

我的故鄉，生我又養我二十春秋。那里的
許許多多的東西，那些山，那溪水，那村人，
還有那些事，竟在一束：豆蔻之色的紗綫綉成
的一件件暖夏涼的土布衣服，為我的靈魂遮風
蔽雨，又給以一種厚厚溫馨的遮蓋。故鄉如今
依然很窮，因為那里的山太高，太陡，挡住了
她的出路。那里的人至今仍活得很苦，因
為他們的出路被又高又陡的山挡住了。但是，
他們的事沒有那麼悲劇，去以外國一拋大
地，他們的長春分了。但我終於從那里走出來了。
走出來以後，我才覺得冬日的山人的那國事
分。主要因為視上輩，今世下世的恩怨又比他的

开掘生活的文化底蕴（序）

冉易光

按时下流行的说法，阿多（谢再明）属于晚生代作家。1963年早春，他出生在黔江县五里乡一个地道的农家。那是乌江腹地的一个偏远县份，是现在四川省黔江地区的属地。五里，离县城上百里，离乌江更有数百里之遥。那里山高路远，瘠岭荒坡，山风粗砺，人的生存环境之艰难，三两语不好细说。能够摇摆着走路了，阿多便在这些山岭间放牛，与山泉和马桑树为伴。小学的头三年，阿多的主要学业是读毛主席语录，写难成篇章的大批判文章。其后，又回到他的山村，为家人也为自己挣工分，企图养活自己，但每天所挣的两个工分，折算起来，只相当于4分人民币。那时他才十一二岁。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读完初中（虽然仍是以学农为主，打柴、挑煤、种药材，什么都干），接着到县城读中师。毕业后，他分回老家五里乡教书。以农家子弟而谋得一个职业，这是很不错的。阿多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山泉和马桑泡滋养出他热情、坦诚、坚韧不拔的性格，也蓄养着他的高远之志。低矮的马桑树遮挡不住他远望的双眼。他善于行动，渴望把理想变为

现实。正是在这时，他很投入地学习写作，也很投入地从事教学工作。他为自己的创作定下不低的标尺，并很快取得初步成功。他在首届教师节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那时是1986年，他才22岁。这是个吉祥的年龄，他走出了生他养他的五里。

复述阿多的这段履历，意在说明，阿多与晚生代作家们又有诸多不同。阿多的独特的生活阅历和生存环境，决定着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他并不类同多数晚生代作家游走于生活的边缘，他以热情而又冷峻的目光去正视生活，正视生活的主流，正视生活的良善和邪恶，努力触摸生活的本质。他不把写作当成纯粹私人化的行为，他在写作中融入较多对生活的个人体认和感悟，而又不玩弄“精神自恋”的文学游戏。他关注更加广阔的社会和人生。

由此，我们便能够为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寻找到一种最为恰当的解释。

从编年的角度研读阿多的作品，首先进入阅读视野的是他写于1983年，发于1987年《民族文学》的短篇小说《日子》。这是阿多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也是最为得意的作品。

领略过近年不少文坛新秀出手不凡的力作，仍然惊讶于阿多的出手不凡。写作《日子》时，阿多才刚满20岁。那时，“文化寻根”小说的喧嚣还处在酝酿之中，《日子》就已经将笔接触到庸常生活的文化层面，去发掘生活的文化底蕴。

割完谷子之后苦竹寨便进入慵懒的冬季。偶尔撵打个把野猪刮了炖进鼎罐里，然后一寨人围着鼎罐和火塘听麻哥爷摆龙门阵。麻哥爷是苦竹寨的精神领袖。那里地处僻远，物

质和精神自成一统，麻哥爷便成了山人的精神偶像。麻哥爷年轻时躲过抓壮丁，挑过盐，抢过粮，也进过妓院，就拥有在火塘边摆说龙门阵的资格。那龙门阵是历史，是哲学，是从山地滋养起来，又转而滋养山地的文化。阿多发现的，是这种文化的不可抗拒的吸附力和那一份神秘的魅力。

一个叫毛狗娃的小娃崽在例常的聚会里窥见了麻哥爷的一个秘密：他从腰间的褡裢里用干瘦的手抠出一粒绿豆大小的东西丢进嘴里，那神秘的东西使麻哥爷显出很受用的样子，甚至使麻哥爷连喷香的野猪肉也失了兴趣。待毛狗娃寻了机会把小手偷偷伸进褡裢时，他发现那里其实空空如也。又长大了几岁的毛狗娃试验着从自己的小口袋里捻一个布绒球丢进嘴里，后来又将几粒小石子儿丢进嘴里，但都没有寻找到类似麻哥爷的那种感觉。为了寻找到象麻哥爷那颗色彩神秘味道儿极难辨别的東西，毛狗娃开始自己的人生远行。

《日子》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缀连作品、吸引读者的是那条神秘的文化之链。

苦竹寨人凭了麻哥爷的龙门阵而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大厦。麻哥爷是以那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东西支撑着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毛狗娃将寻觅麻哥爷的神秘东西作为自己的精神推力。麻哥爷死了。苦竹寨除去多了几幢新的吊脚楼，依然故我。而毛狗娃又回到苦竹寨。毛狗娃去过多少地方？寻找到那神秘的物子没有？毛狗娃会不会成为继麻哥爷之后的又一茬新的精神领袖？阿多没有说。小说嘎巴脆地打住在应该打住的地方。我们又分明看到，连接着那一个又一个庸常日子的，是那一条虽然看不见却确凿存在着的神秘的文化之链。它扣结成一个无限循环的圆，苦竹寨人就在这个圆圈之内涂写自己的和苦竹寨的生命史、生活史，敷演或悲或喜的

人生活剧。

《日子》也就成了可作阐释的多向度选择的小说文本。

《看不见木排的小河》也是在粗粝的生存背景上来绘写人生悲喜剧的。一个叫山的挑盐汉子在一次赌博中赢了开腰店子的驼背老五的两个女人——春花和秋花。山爱两个人，两个女人也爱山。两个女人又恨山，因为山平分了他的爱，无论春花还是秋花，都不能将山独占。山又出门上了挑盐的山道，却一去不再回来。等山回来等老了两个女人。两个老了的女人也没忘了为一块坟地而明争暗斗。那块坟地又稳又高，重要的是，它朝向山可能会回来的那个方向。

这是个充满浓郁抒情色彩的故事。正是这种浪漫的情调，掩饰了故事本身的平庸。不仅如此，阿多着力开掘的，是庸常男女情爱故事之后的文化底蕴。自然的瘠地，也能生长情爱的绿草。他（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又用这种爱来滋养苦寂的生活。这是对匮乏的物质生活必不可少的补充，从而构成山地文化的一大显著特色。以文明土壤蓄养起来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评价阿多小说中的价值取向，是不很相宜的。比如，显然不好以前卫的女性主义理论来批评《木排》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这里是一条连木排都很难见到的小河，作家翘首而望的，是生命的原始涌动，是文化的朴拙形态，是人的单纯而又强烈得缺乏理性的欲望之火。正是这些让现代文明中人惊讶不已的生活内容，构成了山地的全部文化。阿多体验着它，发掘着它。他难以走出山地给予他们的文化宿命。

二

《拉拉渡》是阿多继《日子》之后的又一个重要作品。

《拉拉渡》承接《日子》的余绪，在对生活的文化底蕴紧

紧盯注和深入开掘之外，还展示了生活的流动和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和人的文化心态的不易觉察的悸动。

拉拉渡的老船工阿阿公和《日子》中的麻哥爷一样，身上堆积了太多的历史的尘埃，而成为拉拉渡周遭土蛮人的精神领袖和文化象征。年轻时他在唐岩河上走船，几个捎了婆娘下山赶耍场的汉子以婆娘作注，赌人赤裸了身子从闹市穿行而过。阿阿公抓一条篙杆，咋呼着“借条道——我那渡船下滩哪！”从惊惊乍乍躲闪唯恐不及的人缝中飞奔而过。他果然赢了那些女人，在赌输了的山上汉子们躲到一边时，他跳上河中间载着那些女人的渡船上，一口气放翻了七八个婆娘。他以他的强悍和智慧赢得了他人所不及的名声。他还和有三百多挑水田十个婆娘和七八杆枪的罗汉松打赌喝酒，从罗汉松手里赢过一只陶罐。这只上过釉彩，肚腰上刻着鱼尾纹的陶罐，据说曾是罗汉松用四条半手下弟兄的命换得，落入阿阿公之手而一方豪强罗汉松却对他秋毫无犯，这本身就有出奇。两个传奇故事使阿阿公在唐岩河两岸声名大震。阿阿公却隐瞒了另一桩传奇经历：正是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划船将湖北来的贺胡子的队伍载过河，让贺胡子捉了罗汉松，用棕绳绑死拖在马屁股后头。罗汉松的一把沙刀，则永远地留在阿阿公的背缝里。

阿阿公得以自守自己的精神空间。有那只不为外人所知晓的神秘的陶罐相伴，他便在拉拉渡的渡船上，从回忆中一遍又一遍品咂往事。他不需要和现实有什么联系，除了眼前的载人过来又过去的渡船。阿多从阿阿公身上发现乌江地域山地文化的单纯质朴、封闭保守，而又坚持顽强。和贺胡子的那一段难得的交往，贺胡子“把渡口摆好”的郑重嘱托，是阿阿公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阿阿公的一生因之大放异彩。这

又成为了阿阿公沉重的精神负累。他死守渡口而不愿挪窝半步。他对在渡口之上还修建着的吊桥表示某种不屑，除了吊桥会使渡口冷淡萧条而心里感到难受外，还有以前唐岩河上所修吊桥三天两头梁断人翻而来的忧虑。

拉拉渡又不同于苦竹寨。拉拉渡的吊桥不管阿阿公愿意不愿意，凑不凑份子，很快就落成通行，刻写赞助者姓名的永铭碑，也立了起来。欢天喜地踩过吊桥之后的一天早上，人们发现永铭碑上脚基上一只老南瓜大小的陶罐。上过彩釉，腰肚上刻着鱼尾纹，模样奇特，大雾大露的清晨不沾半点水露。用镰刀刮去一点釉彩，底下现出银白。这是无价之宝！永铭碑刻不刻上阿阿公的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阿阿公以这一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变迁着的世事的认同。时光可以流转，阿阿公仍然是唐岩河两岸土蛮人的精神偶像。那么，这只神奇的陶罐后来被收破烂的买走，不知所终，对阿阿公而言，就不是一件憾事，这意味着阿阿公完成了自己最后的精神涅槃。

世风不古，人心依旧。这依旧的人心，既不拒绝对迁徙着的世风作出必要的回应，又坚守着自在的精神空间。

在阿多的短篇小说《火铺》中，石匠帮帮立志打通黄候寨通往外界的险峻山道手爬岩，山里的女人猜不透他的心事，他因此讨过三次女人又三次将这些女人逐出家门。坤婆娘因为丈夫坤没有这样的志向，而把坤看做“骗牯”（阉过的公牛）——是个男人，却不是条汉子。帮帮打通手爬岩回到寨子里的家，家是冷清的。有一个女人却把火铺烧得暖烘烘的守候着他。那里有煨在火塘边的包谷酒，有供他和那个女人——坤婆娘做爱的又宽又长的木板凳。

帮帮和坤婆娘，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有的，只

是一点点改善生存空间的质朴愿望。这种改善，一半是为了赖以栖身的山寨，一半是为了自己。这是一种限囿。又正是为了这种限囿，他们才显得如此地真实，如那些不作过多雕饰的吊脚楼。他们的走到一起，也就灿然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辉，一种质朴而又圣洁的理想主义。

新作《五月的乡村》以一个小中篇的规模来呈显乡村对现代文明的强烈企望。这一点正与《火铺》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火铺》中的男主人公帮帮以自己的力量打通手爬岩，从而实现自己的夙愿，《五月的乡村》中，男主人公村长马安想假外力让穷山村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结果不仅愿望落空，还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阿多没有一般地处理在时下已显得不很新鲜的故事，他仍很注意探究表层故事之后的文化动因。马安的轻信和异想天开是建立在乡村这一文化背景之上的，他身不由己，经由这种传统而又粗粝的文化所驱动。这个身子进入了九十年代而脑瓜仍滞留在“东方红”和“沙家浜”时代的新任村长，得知十多年前的情人马草儿的相好日本人龟头正雄愿意到马家村来投资的消息，不存半点犹疑便信以为真。他对龟头及他的那个岛国其实所知甚少，他信命，这命里有他与马草儿的一段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缘，他要想赌上一回。于是他鼓涌村民全体动员，修好半山堰，修好水车，修好老磨房，酿好包谷酒，打扫干净吊脚楼，等着日本人来，露露马家村的脸，也狠掏日本人一注银子。全村一片躁动，几近进入癫狂状态。

马安自己并没有振臂一呼便万众响应的能耐，是时势使马安成为暂时的英雄。那个一直没有出场的日本人到马家村投资和安家的许诺，才是真正的动因。而日本人连同他的许诺，又只是一个符号，它的对应物是“金钱”。与城市相较，

乡村更不具备抵御物欲侵蚀的能力，物欲使乡村陷入一片迷乱之中。新任村长马安想借此压老村长三叔公一头，三叔公野心勃勃企图重新握有支配权力，乡长拨拉起抓马家村这个典型进可以邀功请赏退可以杀一儆白的如意算盘……乡村是如此脆弱到不堪一击。乡村又以它积淀深厚的坚韧和宽博情怀接纳和化解了被愚弄的全部痛苦。这使作品在习见的生活事象之后具有了一种深度。

《五月的乡村》以欲哭无泪的闹剧形式来传达乡村的躁动和沉重。日本人的允诺自然只是讨马草儿欢心的花言巧语，读者已然意料到这样的结局。读者又关心马安们如何展开和结束这场闹剧。这迎接日本人的到来，马家村折腾得天昏地暗，也就误了将能生娃崽的女人们打发到乡上去做例行的受孕检查，此事惊动了县上，朱副县长领头统带一帮人进山来兴师问罪，马家村人误以为日本人光临乡村，敲锣打鼓放鞭炮吹大号放堰水转动水车展览山羊和黄牛，搅弄出一片乌烟瘴气，乡长情急中巧舌如簧称此举实为通过抓精神文明和乡村企业来促计划生育，使朱副县长一行转怒为喜。闹剧并没有结束。马家村的男人女人们只因为忙于迎接日本人而“忘了干那事儿”，乡上却以“公而忘私，马家村空缺大肚皮”为题，大力宣传他们计划生育的先进经验，过几天县委书记将亲自带队进驻马家村召开现场会。马家村人能否又一次化险为夷，尚不得而知。

乡村拥有自己延续千百年的“原欲”，乡村又千百年来固执地守望着沉寂。当下的乡村，人的欲望如浅池中的沉渣被如此轻易地搅动而起，阿多留给读者一份沉重的答卷。

三

进入九十年代，阿多有了一组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这与这时的阿多已经成为半个城市人有关。他来到城里，辗转于几个机关之间，从小秘书到办公室主任，体味着与五里乡迥然相异的人生。他还颇费心力地在城里安了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窝。

他没有刻板的摹写这些生活。他有自己盯注的焦点。

这一组小说中，《花圈》具有相当的份量。在不断变迁着的城市风俗画的厚重背景上，流动着历史沉重的阴影。

一个叫阿珍的女人从湘西乡下来到这座县城，与在城里当建筑工的丈夫相会。他们只欢聚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丈夫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永远离开了人世。乡下女人阿珍受不了这一残酷打击，更承受不了城里女人认定她是克夫的“白虎星”的流言蜚语。她终于精神崩溃、被好心的街道办事处胖姐送进疯人院。当胖姐将她从疯人院接出来，要为她找一份省力的活路挣钱时，她只要了丈夫曾经住过的窝棚。她难以从失去丈夫的阴影里走出。后来胖姐说城里死了人时兴送花圈，你就学做花圈吧。阿珍便学做花圈，越做越好，加上看仓库的叶木松写的一手好字，阿珍的花圈就有了很红火的销路。文化给乡下人阿珍的城市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乡下人阿珍又以自己的创造更新着城市的文化面貌。城里人开始将得到阿珍制作的大而精致的花圈作为人生得失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参数。但是，生活不会让阿珍尽掠其美。

命运之神将叶木松推向阿珍。叶木松也是个在城里受尽挫折的乡下人。当兵回到乡下的叶木松，娶了女人，生了娃娃，小日子甜甜美美。不料他当兵时的副团长，现任的县城

武装部王部长记起他能写写画画，一句口信便传他去县城武装部当了公务员，不久便是“文革”，他的部长也上了大街的大字报。对老首长的耿耿忠心和报答知遇之恩使他夜里走上街头，去涂盖那些让老首长蒙受耻辱的大字报。他被人捉住并被用棕绳反吊在街边的柳树上。他想小便而不得，活活地憋出男人羞于启齿的病症。从此他绝少回老家，荒了自家的包谷地，也荒了自家的女人。他被发配到一个公司的仓库当保管员。这个仓库就在阿珍的花圈铺的对面。经胖姐引荐，两个沦落人走到一起。

相逢又相识，他们相濡以沫，情投意合，是理想的一对。但是，他们能尽男女之礼，却不能行男女之事，他们中间隔着厚厚的壁障——性。

阿多不想为阿珍和叶木松设计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那过于平庸，过于肤浅。在阿珍和叶木松身上，都有太多的文化负累，有一重要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阿珍是个来到城里的乡下女人，她失去了太多的爱和性，她就有理由向生活乞求本应属于她的东西。她需要一个两者都能给她以满足的完整的男性。她是一个城里的乡下女人，她的文化成长和文化构成，使她很难接受没有性的爱。在叶木松，出于同样的文化动因，他不会理直气壮地将自己当做是阿珍的合格男人，他从生理到心理都呈阳痿状态。

小说的结尾，叶木松一个人去了一别几十年的老家，甚至没向阿珍告别。叶木松离开城市，既是对无性的爱的躲避，也是寻找自己的根的一种尝试。在城市，他备受挫折，他的回归乡土，或许会让他重新振作起来？阿多对此是持一种认同的立场的。留在城里的阿珍，也生出思乡之念，想中秋节湘西老家的院子里，可以望见天上那一轮银色的满月，不禁

心驰所往。这是一种局限，又是他们无可回避的文化选择。

历史的伤口难以抚平。人生中那许多宝贵的东西，不会失而复得。譬如阿珍，她和叶木松的短暂的温情，只能暂时安抚两颗凄苦的灵魂，却不能弥合作为人，特别是作为女人的全部创痛。圆月依旧，心灵镜像却已破成碎片。这样看来，花圈本身便是无言的象征。那种表面的，炫目的华彩，遮掩不住骨子里的死亡阴影。

阿多的近作《吾哀吾猫》，从猫事荟萃中看取世相人情，折射文化心态。养猫给城里人的家庭带来新的愉悦，也制造新的烦恼，但毕竟，“没有猫的日子，虽然还是日子，但总不及有猫的日子”。有猫的日子有了波澜，有了人性，有了人的心灵的碰撞和交流。这些都是城市现代文明所日趋萎缩的生活内容。猫是城市人文化失重的一种平衡力量。猫最后死于鼠药。猫必然死于鼠药。猫长大会咬老鼠之后被邻居们借去捕鼠，邻居们又仍一如既往地用药毒鼠。人有意无意忽略了猫与鼠药不能共存。人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在扼杀自己，扼杀自己的人性。人如果能够想到拯救猫，人就最终有办法从工业文明的废墟和陷阱中拯救自己。这却很不容易，因为现在我们正普遍地沉浸在物质文明的狂欢里，我们来不及留意狂欢之上悬布着的道德滑坡的阴云。

阿多的庸常的猫事，能否多少给现代人一点警醒？

四

阿多在对不得不从事的职业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克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对工作的克尽职守，使他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创作时间。我们和他一样，都感到十分惋惜。但工作和职业又是他自立自强的重要一翼，他人不好勉强。当他有闲暇